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四史/汪高鑫,李传印主编.-北京:蓝天出版社,
2008.2

(经典点睛)

ISBN 978-7-5094-0054-8

I. 二… II. ①汪…②李… III. 中国-古代史-纪传体-
通俗读物 IV. K204.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4011号

经典点睛系列丛书

二十四史 /汪高鑫 李传印 主编

策 划: 陈学建 张 明
丛书主编: 杨京旺 金永吉
丛书副主编: 傅晓莉
责任编辑: 许志强
特邀编辑: 张 裔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出 版: 蓝天出版社
发 行: 蓝天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字 数: 740千字
印 张: 39.25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前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史籍浩如烟海、世无匹敌的文献之邦。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促进了文献的繁荣，而浩繁的文献作为一种载体又代代不断地传承着这一伟大的文明。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二十四史”既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史记》到《明史》，这被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称为“正史”的24部纪传体史书，从历史编纂而言，它自成一个史书大系，堪称为世界文化奇观；从记载内容而言，它上起黄帝，下至明朝灭亡，包含了4000多年的历史；从撰述时间而言，它从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撰写《史记》开始，到清朝乾隆年间刊行《明史》为止，前后历时19个世纪。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编纂规模之大，还是反映的内容之丰富，“二十四史”作为历史文献，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当历史的潮流将中华民族推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站在这新千年的起点上，我们将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审视民族的过往历史，去反观民族的传统文化呢？

经验和理智告诉人们，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之中国的继续，现实与历史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我们割断历史，抛弃传统，我们的民族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毛泽东同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一个经典的说法：“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不但不能割断历史、忘掉文化传统，还应该好好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我们今日之所以要阅读“二十四史”，是因为从中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曾经是怎样地艰苦创业和开拓进取，又是怎样地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终于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以了解我们伟大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优秀人物，其中有为民族

国家的形成、发展、繁荣和统一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政治家，有对民族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万世景仰的思想家，有声名流传古今文坛的文学家，有为民族科技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有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军事谋略家，他们都是时代的骄子。我们坚信，只要打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座宝库的大门，她必将会以其特有的魅力和博大精深震撼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我们会从中吸取智慧与力量，获得借鉴与启迪，从而斗志昂扬地去创造中华民族辉煌的明天。

当然，中华民族既有辉煌的时代和成功的经验，也有受尽屈辱的悲切和失败的教训；既有众多爱国为民、功在千秋的民族精英，也有祸国殃民、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对于民族的屈辱历史，我们不能忘记，要以自己的奋发努力雪国耻；对于历史上的民族败类，我们应该予以鞭挞，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二十四史”过于浩繁，使得广大非历史专业的人士望而却步。所谓“登堂必自阶始”，为了给广大读者寻求这样一个通往“二十四史”之“堂”的“阶”，我们编写了这部《速读二十四史》。其具体做法是：（一）史家生平与史著介绍部分，以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准确的语言说明时代、史家与史著的关系，突出每一部史著的特点。（二）名篇点评部分，选文力求经典性、代表性、故事性，即通过以简小而不失具体、全面的选文努力展现“二十四史”的整体风貌；而点评作为本书最为重视的部分，其撰写旨趣在于揭示选文的思想内涵及其对于现代人的借鉴价值。（三）千古名言部分，包括原文、原义、引申义和今用，旨在体现古语的今用价值。（四）推荐书目部分，对每一部“正史”都介绍几部有关的通俗读物和研究著作，以便读者对“二十四史”有更多的了解。总之，《速读二十四史》是一部为初学者了解“二十四史”而编写的通俗而简明的读物，希望它确能引领读者步入“二十四史”这座历史文化神殿的厅堂。

参加本书撰写的人员是一批有志于弘扬传统文化的史学工作者，本书的撰成出版，有赖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同时，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借鉴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因限于篇幅而未能一一注明，在此谨致诚挚的感谢。

汪高鑫

2003年12月于北师大丽泽楼



目录

《史 记》.....	1
鸿门宴 /11 文景之治 /14 勾践卧薪尝胆灭强吴 /15	
陈胜大泽乡起义 /18 司马迁论善恶有报 /21	
管仲佐齐建霸业 /22 商鞅佐秦变法 /24	
冯驩买义 /26 毛遂自荐 /28 信陵君窃符救赵 /30	
蔺相如完璧归赵 /32 田单大摆火牛阵 /34	
鲁仲连义不帝秦 /36 屈原忠贞遭放逐 /39	
李斯谏逐客书 /41 韩信登坛拜将 /43	
叔孙通定朝仪 /45 李广难封 /47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50 辕固生论辩汤武革命 /52	
财富论 /53 论六家要指 /56	
《汉 书》.....	62
班固诸子论 /71 贾谊论体貌大臣 /74	
苏武牧羊 /76 张骞出使西域 /79	
朱买臣衣锦还乡 /82 东方朔诙谐滑稽 /83	
杨惲恃才凌人被腰斩 /85 陈万年教子 /87	
霍光佐汉中兴 /88 赵广汉注重调查研究 /91	
严母训子 /93 原涉重义轻法 /95	
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 /98 王莽代汉 /100	

《后汉书》	107
昆阳之战 /116	
刘玄淫逸亡身 /119	
窦宪封燕然山 /121	
马援择主而仕 /123	
梁冀飞扬跋扈 /126	
班超鄙善奇袭 /128	
张衡斥讖纬虚妄 /130	
陈寔做官善变通 /132	
鲍宣妻修行妇道 /133	
党锢列传序 /134	
宦者列传序 /137	
方术列传序 /139	
《三国志》	144
官渡之战 /152	
董卓残忍成性 /154	
荀彧数劝曹操 /156	
仓慈治民有术 /159	
诸葛亮隆中对 /160	
诸葛亮出师表 /162	
关羽失荆州 /163	
孙权屈身受策封 /164	
赤壁之战 /166	
吕蒙智降郝普 /168	
夷陵之战 /170	
韦曜直书被诛 /172	
《晋书》	178
诸葛亮鞠躬尽瘁五丈原 /183	
贞观君臣评说司马懿 /186	
石崇王恺斗富 /188	
励精图治的前秦王苻坚 /190	
淝水之战 /193	
《宋书》	200
孙卢平，桓玄灭 /205	
佐臣刘穆之 /208	
元嘉之治 /210	
荒唐天下，骨肉相残 /213	
皇逼官反 /215	
彭城之辩 /218	
自古书生多意气 /221	
良吏之风 /224	
范晔之死 /225	
《南齐书》	230
永明之世 /235	
“书橱”陆澄 /237	
骄奢亡国之东昏侯 /240	
“异人”张融 /243	
《梁书》和《陈书》	246
评梁武帝 /250	
魏徵评梁朝诸皇帝 /252	
多才宽仁的昭明太子 /254	
侯景之乱 /257	
陈后主亡国 /259	
史学功臣姚察 /262	
何之元传 /265	
《魏书》	271
初遭法难 /276	
太和改制 /279	
迁都洛阳 /282	

国史之狱 /284 狗脚朕 /286	
《北齐书》.....	290
论北齐王朝的开创者高洋 /293 论孝昭皇帝高演 /295	
杜弼论学 /298 战乱年代的科学家 /301	
《周书》.....	305
周齐大战晋州城 /308 战乱母子情 /311	
周武帝剪除权臣 /314	
《南史》和《北史》.....	320
简而不失，淡而不流的谢弘微 /327	
王僧达羞辱路琼之 /330 大发明家祖冲之 /332	
改革皇帝孝文帝论赞 /333 河阴之变 /336	
尔朱荣专权被杀 /338	
《隋书》.....	343
亡国之君隋炀帝 /348 开皇名臣高颍 /351 经籍志序 /354	
《旧唐书》.....	361
玄武门之变 /366 “明镜”魏徵 /370 三千宠爱在一身 /371	
文成公主和亲 /373 玄奘西游 /375 刘知几论史才三长 /376	
杨炎创两税法 /377 甘露之变 /379	
《新唐书》.....	384
韩愈谏迎佛骨 /389 唐代酷吏 /391 安禄山的“赤心” /393	
“诗仙”李太白 /394 中唐名将郭子仪 /396	
雪夜袭蔡州 /397 朋党难去 /400	
《旧五代史》.....	404
守业有成唐明宗 /409 长乐老冯道 /412 海龙王钱穆 /414	
荆南高赖子 /416 前蜀明主王建 /419	
《新五代史》.....	424
伶人敬新磨掌批唐庄宗 /428 乱世枭雄朱温 /431	

才子帝王李煜 /434	儿皇帝石敬瑭 /436	
壮志未酬周世宗 /439	王彦章死节 /443	
《宋 史》.....		448
陈桥兵变 /457	杯酒释兵权 /460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 /462		
吕端大事不糊涂 /465	寇准劝帝亲征 /468	
千古忠烈杨家将 /470	刚正坚毅包青天 /472	
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 /475	王安石变法 /478	
郾城之战 /481		
《辽 史》.....		486
诸弟之乱 /490	耶律大石西行万里建西辽 /492	
断腕太后 /494	君臣相得 /496	韩德让 /498
耶律休哥算无遗策 /500	托栗讽谏 /502	
方正清廉大公鼎 /504	大奸大恶耶律乙辛 /506	
《金 史》.....		510
太祖起兵反辽 /514	海陵弑君夺位 /517	
孳孳求治金世宗 /519	宗弼南侵 /521	
张行信无所畏避 /524	高琪误国 /526	郭虾蟆忠义殉国 /528
《元 史》.....		533
一代天骄 /542	忽必烈建国 /546	李璫之乱 /548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 /551	脱脱大义灭亲 /554	
长春真人丘处机 /556	帝师八思巴 /558	
《明 史》.....		564
靖难之役 /576	贤良淑德马皇后 /579	开国元勋徐达 /582
足智多谋的刘伯温 /584	方孝孺被夷十族 /586	
于谦留得清白在人间 /589	刚正不阿海青天 /591	
张居正匡救时弊 /594	戚继光抗倭 /596	郑和下西洋 /598
魏忠贤专权 /601	严嵩一意媚上,戕害忠良 /603	

《史 记》

【史家生平】

公元前 145 年（一说前 135 年），在今天陕西省的韩城（汉代左冯翊夏阳），诞生了一位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学之父的伟人，他就是《史记》的作者、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的远祖是以“世序天地”、“世典周史”为职业的，到东周惠王、襄王时，这个家族开始散居于各诸侯国，从此失去典史职业达四百余年之久。从直系近祖司马错开始，这个家族主要从事军事和经济职业，司马错和其孙司马靳都是战国时期秦国名将，军功卓著；司马靳之孙司马昌为秦时铁官，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则为西汉初年长安城分管一区商业的市长，都是主管经济的官员。远祖的典史之职为司马迁父子所继承，而近祖的军事和经济经历则丰富了他们作为史学家的素养。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即司马无泽之孙），是西汉一代学者、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从小仰慕远祖“世典周史”的职业，立志要远绍祖业，重振这个久已失传的家学。他勤学多闻，依靠自己的才学，于汉武帝建元年间（前 145—前 135）步入仕途，开始做太史丞，后来升为太史令。汉代太史令主要职责是掌管天文星历、占卜祭祀和档案文书，同时也实录大事。但是，司马谈却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他要以撰写古往今来的历史为己任。为此，他拜师求学，《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



司马迁像

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与黄子都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大学问家，司马谈向他们求学，当然是为论载历史做知识储备工作。同时，司马谈还注意利用史官的身份收集天下逸文故事，研究先秦诸子百家学术和古往今来的历史，为论载历史做资料储备工作。从后来成书的《史记》的实际创作来看，司马谈确实做了大量的初创工作。他发凡起例，对《史记》的五种体例都有不少成篇的作品，这一点已为后人所认可。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论载历史的梦想未能在生前得以实现。因此，他临终嘱咐司马迁一定要接任太史令，希望儿子能像周公、孔子那样重视论载历史，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建立起扬名后世的伟大功业。

司马迁自幼就刻苦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这里的“古文”，《史记索隐》引唐人刘伯庄的说法，认为是指《左传》、《国语》、《世本》等书。诵读这些记述历史的“古文”，无疑为司马迁日后成长为杰出的史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岁时，在父亲司马谈的精心安排下，司马迁进行了一次远游，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足迹踏遍江淮各地，历时长达数年之久。这次远游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今后论载历史做实地考察工作。王国维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中将之称为“宦学”。司马迁这次“宦学”，不但增长了见识，拓展了视野，而且还收集到了很多宝贵的历史材料，这些都对后来《史记》的撰写成功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年—前117年），司马迁师从西汉著名的经学家董仲舒和孔安国，主要学习《公羊春秋》和《古文尚书》等儒家经典，从日后成书的《史记》可以看出，这两位汉代大儒对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

大约就在这时，司马迁开始步入仕途，做了郎中的官职。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以郎中身份随从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这既是司马迁参与的一项重大的军事活动，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实地考察西南夷地区的大好机会，对以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写作成功有很大影响。自从司马迁做了郎中以后，曾多次扈从汉武帝巡幸各地，这不但使司马迁因此得以对汉武帝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也对汉王朝的封禅活动有更多的直接体验，这就为以后《史记》的《今上本纪》和《封禅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汉初太史令为世袭官职），开始“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太史公自序》），撰写《史记》。当时汉武帝正准备修改历法，由于掌理天文星历是太史令职责所在，司马迁也参与了修历活动。太初元年（前104年），新的历法修成，这便是西汉著名的《太初历》。修历

活动对《史记》的撰写计划有一定的影响，原来司马谈打算将《史记》的下限“至于麟止”（鲁哀公十四年获麟是《春秋》绝笔之年，汉武帝元朔七年也恰好获得白麟，司马谈便效仿《春秋》故事，以此年为《史记》绝笔之年），由于修历是盛世之举，司马迁以能有幸亲身参与而引以为自豪，这促使他决定要将《史记》写作的下限改为“太初而迄”。在司马迁看来，将《太初历》的修撰载入史册，这既是史官的职责，也是司马迁的骄傲。

修历工作结束后，司马迁续撰写《史记》。到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经过数年的撰述，《史记》正值“草创未就”之时，不曾想司马迁却在这个节骨眼上突遭飞来横祸，他因受李陵案的牵连而被逮捕入狱，处以宫刑。

事情缘由是这样的，天汉二年，汉武帝下令由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三万人北击匈奴，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作为策应偏师。李广利乃汉武帝宠姬、倾国倾城的美女李夫人的哥哥，他以外戚受宠，其实只是一个庸将，汉武帝此次派他北击匈奴，目的是想让他借此立功增封；李陵乃西汉名将李广之孙，平生行事有乃祖之风。大军出发后，事态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率领主力军队北伐的李广利，没有遇到匈奴的主力，却竟然损兵折将而返；而率领五千策应偏师的李陵，在深入敌境后，却遭遇到了匈奴单于亲率的八万骑兵主力的重兵包围，李陵且战且退，经过十余天的激烈战斗，消灭匈奴兵一万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在距离边塞仅一百多里的地方全军覆没，李陵投降匈奴。事后廷议此事，朝中一些人将兵败的原因归罪于李陵，司马迁同情李陵，认为这些议论有失公正，便向汉武帝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报任安书》）

汉武帝起初是接受司马迁的看法的，并且还派公孙敖率兵深入匈奴境内，以迎接李陵归汉。公孙敖在边境候望一年多，没有等到李陵归来，便谎报李陵为防备汉军北伐，正在训练匈奴兵。汉武帝得知此情，非常气愤，不但族灭了李氏一门，为李陵申辩的司马迁也被以“诬罔”罪逮捕入狱。按汉律，“诬罔”是一种死罪，若想免去一死，可以纳钱五十万赎死，或者接受宫刑。司马迁虽说出生于书香门第，却只是一介寒门书生（太史令的品级不过六百石），家里自然拿不出钱来赎死罪，剩下的就只有或接受死刑，或接受宫刑。这使司马迁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接受宫刑，这对士大夫而言是一种奇耻大辱，生不如死；接受死刑，则意味着《史记》将无法撰成，他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两难相权，司马迁最终选择了宫刑。司马迁在后来写的《报任安书》中是这样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把撰写《史记》看作是重于泰山的事业，如

果因受李陵之祸而毫无价值地死去，这就如同“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样的死是轻于鸿毛的。

当然，被处宫刑对于司马迁的身心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绌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报任安书》）在这里，司马迁一口气说出了人生十大耻辱，而腐刑（即宫刑）则是十种耻辱中最大的耻辱，一个“极”字道出了司马迁这种极度痛苦的心情。也正因此，司马迁在受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一直处于极度恍惚之中，“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每想到此事，“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不过，司马迁既然勇敢地选择了宫刑、选择了生，也就不会被这种奇耻大辱所击倒。相反，逆境更加激发了司马迁发愤著述《史记》，以成就这一扬名后世的事业。为了勉励自己发愤著述，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一气列举了数位身处逆境而发愤成就事业的先贤圣哲，他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这里，司马迁既是抒愤，也是自况，他要以这些先贤圣哲忍辱负重而成就功名的事迹为榜样，来激励自己发愤著述。《史记》一书对那些身处逆境而奋发有为、成就功业的人，每每总是给予赞许、表示敬意的。如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对越王勾践国败受辱后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最终发愤雪耻，灭掉吴国而称霸中原，给予了赞许，称其“有禹之遗烈”；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对楚大夫伍奢、伍尚父子遭奸人迫害致死表示同情，认为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而助吴破楚是弃小义而雪大耻，许之以“烈丈夫”，如此等等。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司马迁出狱，开始了他后期的《史记》撰写工作。《史记》究竟完成于何时，由于史无确载，现已不得而知，据推算，应该大约在公元前90年，也就是司马迁写《报任安书》的时间。司马迁这封书信是对三年前他的好友任安写给他的一封书信的回复，当时任安担任益州刺史，看到司马迁出狱不久就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他为好友由衷地感到高兴，便写了这封信，鼓励司马迁“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希望他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然而任安并不了解司马迁当时的心情，或许在别人看来，中书令是掌管机要的近臣，能获此官职是一种荣耀，但在司马迁看来，担任这种本由宦官充任的官职，对他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更不要说借此身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了。也正因此，当时正埋头

于《史记》撰述的司马迁并没有给任安回信。三年后，《史记》的撰述大概已经完成，司马迁终于成就了自己的泰山事业，而此时的好友任安却因太子事件而被捕入狱，被处以死刑。司马迁觉得该是给任安回信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这一千古名篇《报任安书》。在这封书信里，司马迁尽情地向任安倾诉了自己多年积压在心中的郁闷，其言辞如诉如泣，慷慨悲凉。在这封书信里，司马迁以当代孔子自居，而称被汉武帝处以死刑的任安为“智者”，这其中的隐含讽喻不言自明。书信寄出后，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也就从此销声匿迹了。

【史著介绍】

《史记》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有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和列传70篇，总共130篇，52.65万字，记述了自黄帝以来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上下3000年的历史。

《史记》之所以最终得以问世，首先是时代的产物。西汉武帝时期，一个强盛的帝国已经在东方大地出现。帝国的政治“海内为一”，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帝国的经济则国库充盈，民则人给家足，已是空前的繁荣；帝国的人才“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可谓是群星璀璨。时代需要史学家们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以载记下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正如司马谈所说的，“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太史公自序》）其次是司马迁父子两代呕心沥血的结晶。司马谈发凡起例作《史记》，既是出于史家的历史责任感，又是将历史撰述视为家族薪火相传的神圣事业；司马迁承志修史，虽然历经人生磨难，却能矢志不渝，最终成就了《史记》这一史家绝唱。最后，《史记》的撰述成功，是以丰富的历史材料为文献基础的。《史记》的



《史记》书影

取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前人的记载，该书参考古书多达 30 余种；二是司马迁的采访材料，像《孔子世家》、《屈原贾谊列传》、《春申君列传》、《淮阴侯列传》、《西南夷列传》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采访材料；三是太史令直接掌握的汉代史料，《太史公自序》说汉初“百年之间，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四是司马谈积累的材料，其实司马谈不但广泛收集了材料，而且已经成就了不少篇章，这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基础。

《史记》无论是从历史编纂、历史思想还是人生体验而言，都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从历史编纂而言，《史记》在史书选材、编撰体例、史书书法、历史文学、撰述宗旨和史学认识等多方面的创制，对后世史书编纂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历史思想而言，《史记》在天人观、古今观和历史盛衰观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人生体验而言，由于司马迁是通过撰述《史记》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的，因而《史记》自然也蕴涵了他的人生体验于其中，这就使得《史记》自然流露出的思想情感，千百年来一直都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和感染。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称赞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一个名至实归的评价。

一、史家之绝唱

《史记》在历史编纂与史学思想上，都堪称为史家之绝唱。

从历史编纂而言，《史记》创立纪传体通史体裁，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撰范式。通史写作始于战国时的《竹书纪年》，但是这部史书写成后，却被作为魏襄王的随葬品埋入地下，直到西晋初年才出土。因此，秦汉时代的人们并没有看到这部史书。战国时还有一部史书叫《世本》，也是一部通史著作，其中已包含有“帝系”、“本纪”、“世家”、“传”、“谱”和“氏姓”等多种体例，不过还很不完善。因此，纪传体通史《史记》的撰述，自然应视为一种创作。而且《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通贯上下 3000 年历史，汇总古今百科知识，而自成一言之言，这是《竹书纪年》和《世本》所根本无法相比的。

《史记》内含的五种基本体例，其中“本纪”以编年形式记载王朝更替的历史，是全书的大纲；“世家”记载封国诸侯王以及一些有特殊功业的历史人物；“列传”主要是以人物为主，同时还设立了一些民族史、外国史、经济史等传记；“书”专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沿革；“表”是以谱牒的形式囊括和明了错综复杂的史事，重在表现历史发展线索和大势。这五种体例合而言之，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分而言之，却又能自成体系。因此，《史记》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历史撰述体裁，对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以后，史家作史多以《史记》为圭臬，正如清代史家赵翼所说的，“自此例

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二十二史杂记》卷一）因此，《史记》无疑是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历史编纂的范式。

从史学思想而言，《史记》首先明确规定了历史撰述的基本宗旨。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明确规定《史记》的撰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时空关系而论，“究天人之际”指的是历史撰述的空间范围，“通古今之变”指的是历史撰述的时间跨度，合而言之，它们便是历史记载的全部对象。从理论思维而论，“究天人之际”体现的是一种哲学观，而“通古今之变”体现的则是一种历史观。因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是一种历史方法论，也是一种历史认识论。而“成一家之言”，则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司马迁撰述《史记》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提出自己对历史认识的一家之言。司马迁还对构成《史记》这部纪传体史书的五种基本体例分别规定了撰述宗旨，其中“本纪”是为了说明“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世家”是为了表彰那些“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辅拂股肱之臣”；“列传”是论载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豪杰之士；“书”是为了阐述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典章制度的“承敝通变”；“表”的作用在于明了“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复杂历史事件。（《太史公自序》）当然，这旨趣不同的五种体例又都是服务于《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全书最高宗旨的。

其次，《史记》提出了历史研究的三层境界说。第一层境界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司马迁认为，史家从事历史研究与编撰工作，首先必须要充分地占有历史资料，这是进行历史研究和撰述的前提条件。司马迁写作《史记》，就非常重视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从他所收集的各种历史资料来看，其中既有六经异传、百家杂语和汉初百年间“莫不毕集于太史公”的天下遗文故事等文字资料，更有自己巡游各地所见所闻的各种自然资料、口碑资料。第二层境界是“考之行事”。网罗的“旧闻”并不都能当作可信的资料加以使用，还必须要对已占有的历史资料进行考实。“考之行事”的中心旨意是求真，《史记》一书之所以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之称，（《汉书·司马迁传》）是司马迁重视“考之行事”的结果。第三层境界也就是最高境界，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认为，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求得历史成败兴衰的道理，发现和认识历史发展及其演变的趋势，这是历史撰述的最高境界。很显然前两层次的主旨是求真，后一层次的主旨是求理。

再次，《史记》高扬了人的价值。作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史记》通篇都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在谈论夏、商、周、秦相继更替这一历史发展大势时，司马迁认为，夏、商、周、秦之兴，是兴于修仁行义、积德用力；而它

们的灭亡，也是人为的结果，而非天命。司马迁对历史上大凡有所作为之士，都不惜笔墨，大加颂扬。如在《越王勾践世家》中，他称赞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他非常仰慕孔子，《孔子世家》称赞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陈涉世家》中，他将布衣陈涉起义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充分肯定了陈涉在推翻暴秦统治过程中的首创精神。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将人事的成败归之于天的做法提出批评。在《项羽本纪》中，他否定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蒙恬列传》则对蒙恬将自己的死因归于绝地脉而违忤天意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作为一代名将，没有强谏秦始皇在天下初定时去“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反而“阿意兴功”，他被诛杀是咎由自取。

最后，《史记》重视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所谓“原始察终”，就是要求人们要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过程来加以考察，以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各种因果关系。《史记》撰述的整体构思，充分体现了“原始察终”的原则。如《十二本纪》的撰述主旨是考察王迹的兴衰，它通过对黄帝以来历史发展大势的记述，集中表述了一种德力转换的思想。《十表》则比较明确地将历史划分为上古、近古和今世三个阶段和五帝三王、东周、战国、秦汉之际、汉兴以来五个时期，《十表》合起来看，则反映了自黄帝以来3000年历史发展变化的大势。所谓“见盛观衰”，就是要注意考察历史发展的盛衰之变，避免历史发展兴盛之时可能会出现兴衰的方向的转变。司马迁认为，历史的变易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盛衰变动的过程。合观《五帝本纪》和夏、商、周三王《本纪》，其实表述的就是上古圣王盛德政治的兴衰过程。同样，如果将《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合在一起，我们便很容易看出秦是怎样由割据一方的诸侯到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再到二世而亡的由弱小到强盛再到灭亡的全过程。《十二诸侯年表》集中概述了各诸侯势力此消彼长、更替称霸的全体过程。当然，认识历史盛衰之变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历史向衰的方向转变。这就要求人们必须“见盛观衰”，要能够透过盛世的表象，敏锐地觉察出其背后所隐含的种种衰败的迹象，从而及时更张制度，以防患于未然，使事物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

二、“无韵之《离骚》”

离骚者，因其遭遇而忧愁也。屈原因遭放逐而忧愁幽思以作《离骚》，司马迁则因受宫刑之辱心有郁结而作《史记》；屈原借作《离骚》以发愤抒情，司马迁作《史记》又何尝不是对人生和社会的一种咏叹！用“无韵之《离骚》”来称

颂《史记》，是鲁迅对《史记》蕴涵的思想情感与心灵体验的准确把握。

首先，《史记》大胆揭露西汉帝王的种种丑行，体现了一种抗暴意识。如开国皇帝刘邦，发迹之前本是个不务农事、又好酒色的无赖之徒，为此经常遭到父亲的训斥。做了皇帝后，刘邦竟然还没有释怀于当年父亲对他的训斥，他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高祖本纪》）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的无赖嘴脸也常常是暴露无遗。如有一次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以烹杀刘父来逼刘邦退兵，而刘邦竟与项羽耍起了无赖，他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本纪》）其实在刘邦看来，争天下比保住父亲的性命更为重要。汉景帝是文景盛世时期的明君，同时也是一个不讲信义的君主。他为了堵住叛乱诸侯王反叛中央的借口，企图息事宁人，以保住自己的皇位，而不惜腰斩了对他忠心耿耿、与他积极谋划削藩之事的晁错，让他做了冤死鬼。汉武帝既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是一位残暴而荒诞的君主。他的残暴，主要表现在重用酷吏治民。《史记·酷吏列传》总共写了10个酷吏，其中9个都是汉武帝时期的人，他们是汉武帝推行独裁统治的最好的帮凶和工具。酷吏张汤是汉武帝最信任的人，据史料记载，当时“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张汤手下有个叫王温舒的人，是个杀人成性的酷吏，《史记》说汉武帝却“以为能，迁为中尉。”这一语活脱写出了汉武帝的残暴秉性。汉武帝还是一个“好神仙之术”的荒诞君主，《史记》的《封禅书》和《汉武帝本纪》对此多有披露。《史记》对于帝王丑行的揭露，既是对封建君权的一种蔑视，也是对封建暴政的一种鞭笞。

其次，《史记》赞美悲剧英雄。司马迁遭受宫刑，这是他人生的悲剧，正因此，《史记》对于历史上悲剧英雄人物，总是给予由衷的赞美。《项羽本纪》关于悲剧英雄项羽的刻画，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楚汉相争的第一回合是鸿门宴，当时项羽的实力要大大强于刘邦，因此，鸿门宴上项羽的盛气凌人与刘邦的小心翼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也正是由于项羽的妇人之仁，放走了刘邦，致使谋士范增发出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叹息。垓下之战是项羽的穷途末路，然而，即使是失败了，项羽也不失英雄本色：霸王别姬表现出了英雄柔情一面；三战追兵获胜，却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致使英雄临终发出了“天亡我”的呼号。一篇《项羽本纪》，将这位悲剧英雄刻画得栩栩如生，千百年来，一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人们为这位悲剧英雄而扼腕叹息。又如《李将军列传》，则刻画了一位令匈奴闻风丧胆却又终身不得封侯的飞将军李广的悲剧英雄形象。李广青年从军，一生血战沙场，与匈奴大小战斗六七十次，却至死也未能得以封侯，最终落得个引刀自刭而死的下场。“李广难封”固然是封建统治者压抑人才和刻薄寡恩所造成的，不过，他的英雄事迹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他的悲剧人生也赢得了

人们深深的同情。

又次，《史记》同情历史上的抗暴人物。司马迁是封建暴政的牺牲品，故而《史记》对历史上那些敢于抗暴的人物也无不给予了同情，《刺客列传》便是这样的典型篇章。如春秋时齐鲁交战，鲁国三战三败，鲁庄公准备“献遂邑之地以和”，齐桓公同意会盟于柯。然而，鲁国力士曹沫却在盟会上用匕首挟持齐桓公，迫使齐桓公当众同意归还所侵占的鲁国土地。曹沫的举动体现了这位力士的胆识，也使齐桓公极其狼狈。在司马迁看来，齐桓公毕竟是春秋霸主，而曹沫不过是个力士，可是他却能够为了鲁国的利益而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向强权进行抗争，他的行为确实是可歌可泣的。又如写荆轲刺秦王之事，荆轲在离别燕国时，一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禁使人荡气回肠。在司马迁看来，荆轲刺秦王不但事情几乎不可能成功，而且自己还必死无疑，也正因为这样，燕国太子丹及宾客皆“白衣冠以送之”。《史记》在描述荆轲刺秦王的具体场面时，先是“图穷匕首见”，接着是让人窒息的荆轲与秦王的紧张而危险的搏斗场面，结果是秦王虚惊一场，而荆轲被杀身亡。壮士虽然勇敢地死了，但正如司马迁所说的，它使“暴秦夺魂，懦夫增气”，荆轲的英名将名垂后世。

最后，《史记》颂扬忍辱负重之士。司马迁是个忍辱负重的千古奇伟之士，故而《史记》注重颂扬历史上那些忍辱负重之士。如《屈原贾生列传》写了伟大的文学家屈原的悲剧人生，在司马迁看来，屈原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当时的楚国是君昏臣暗，屈原空有伟大的抱负和满腔的爱国热情，这种“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自然使屈原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他的怀才不遇和因犯颜直谏而遭放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可是屈原本本人却苦苦思索而得不到解答，最终饮恨投汨罗江而死。不过，屈原却通过《离骚》、《天问》、《哀郢》等思想作品，抒发了自己对人生和现实社会的感悟，成就了他人生最伟大的事业。《淮阴侯列传》则记述了少年时代的韩信诸多受辱的故事：他曾因“不能治商贾”寄食于他人之家，而吃白饭自然会遭人讨厌；他曾因洗衣婆给了他饭吃而说日后要报答她，却遭到洗衣婆的训斥：“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将来报答我吗！”更有甚者，他还曾经受屠中少年的胯下之辱，而遭到人们的耻笑。然而，韩信是一个忍小耻而就大义、胸怀大志良谋的人，他当时的落魄，是因为时代没有提供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而当秦末战争爆发后，英雄有了用武之地，韩信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示，数年之间，使这位当年屡遭侮辱的人成就了赫赫功业，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将领。屈原的怀才不遇、韩信的屡屡受辱，不但没有使他们沉沦，反而养就了他们忍辱负重的品格，并因此而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司马迁颂扬这些忍辱负重之士，无疑是一种自况，是在抒发自己通过发愤著述而最终成就名山事业的一种情怀。